第 53 卷 第 1 期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Vol. 53, No. 1
2016 年 1 月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Jan. 2016

阿尔都塞马克思哲学思想“认识论断裂说”批判

安启念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已故著名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发展中存在“认识论断裂”,断裂前马克思是费尔巴哈式的抽象人道主义者、历史唯心主义者,断裂后建立了科学的历史观,成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这种观点流传甚广,影响很大,然而在今天看来并不正确。本文尝试对它加以分析批判,以期深化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与研究。

一

“认识论断裂说”出自阿尔都塞 1965 年出版的《保卫马克思》一书。该书称:“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确确实实有一个‘认识论断裂’;据马克思自己说,这个断裂的位置就在他生前没有发表过的、用于批判他过去的哲学(意识形态信仰)的那部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①使用“断裂”一词,意在强调前后思想有质的区别。

断裂前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意识形态”阶段,从博士论文到《神圣家族》。包括:1. 1842 年前,主要指《莱茵报》时期。此时占主导地位的是离康德和费希特较近而离黑格尔较远的、理性加自由的人道主义,强调哲学批判的作用;2. 1842—1845 年,占主导地位的是费尔巴哈的人本学人道主义。②

断裂后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科学”阶段,从《哲学的贫困》直到去世。包括成长时期,即断裂后到《资本论》写作,以及成熟时期,主要是《资本论》。断裂后马克思创立了历史理论科学——历史唯物主义和新的哲学辩证唯物主义。所谓断裂,即彻底告别、批判此前信奉的人道主义,找到了历史的以及整个世界的发展规律。马克思的哲学思想由意识形态变为科学。

1845 年是断裂时期,包括《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两部著作已经出现了马克思特有的总问题,但是,还部分地以否定的形式和激烈论战、批判的形式出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思想不明确,内容像谜一样;《德意志意识形态》在批判意识形态上态度明确坚定,但用旧概念表述新思想,显得比较含糊。(19 页)

“认识论断裂说”宗旨是否定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思想,认为它们基本上是人道主义、意识形态、唯心主义,不属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断裂说”的提出有特殊的政治背景。首先,欧洲流行的社会民主主义否定阶级和阶级斗争,具有浓厚的人道主义色彩。其次,1956 年苏共 20 大后一些知识分子用青年马克思著作中充满人道主义精神的“异化”“类本质”“自由”等概念批判斯大林,指责他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不人道;苏共 22 大提出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以及全民国家全民党的理论,提出口号“一切为了人,一切为了人的幸福”,人道主义呼声高涨,大有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正统的趋势。于是,挺身而出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成为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统思想的哲学家的政治使命。此外它的提出还有自己的理论背景。第一,1932 年《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出版,受到一些社会民主党人热捧,存在主义和现象学哲学家则把马克思视为自己的同道,他们都为其中的“异化”“人道主义”

① 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7 年版,第 15 页。以下凡出自该书的引文或思想,只在相关位置标出页码。

② 这两个小阶段的划分见《保卫马克思》第 18 页。马克思 1842 年 4 月开始为《莱茵报》撰稿,1843 年 3 月辞去该报主编职务。阿尔都塞把“马克思为《莱茵报》撰文”定为“1842 年前”,有误。

“人的本质”等概念所鼓舞,认为应该用伦理道德的甚至宗教的观点解释马克思。第二,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把揭示了整个世界和人类社会客观规律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观点可以在恩格斯和列宁那里找到充分的理论依据,被苏联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标准理论广泛宣传,深入人心。阿尔都塞本人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建立的历史科学,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产生出了一种新的、革命的实践哲学和理论哲学,“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或者说辩证唯物主义”。(253 页)对马克思早期著作的热捧,人道主义思潮的兴起,与阿尔都塞等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发生严重冲突。正是出于上述政治背景和理论背景,阿尔都塞感到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自己有责任保卫马克思。

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中存在“认识论断裂”,就是阿尔都塞为保卫马克思不被人道主义化而提出的基本观点。他把 1845 年 2 月问世的《神圣家族》及其以前的著作称为马克思思想断裂前的著作。认为它们的理论特征是贯穿了抽象的人道主义、唯心主义,主要代表是《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部受到许多人热捧的著作,在阿尔都塞看来,理论基础是异化劳动,体现的是“马克思后来予以彻底否定的那种意义上的哲学”(149 页),实际上是要用费尔巴哈的假唯物主义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颠倒过来,“这部可以比作黎明前黑暗的著作偏偏是离即将升起的太阳最远的著作”。(19 页)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在 1845 年发生了质的改变,科学历史观取代了人道主义。今天用人道主义解释马克思的人是在开倒车,由科学倒退到人道主义空想。

一百多年来,社会民主主义,形形色色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苏联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实践派,与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立场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了持续的激烈的斗争,其实质是马克思著作中的人道主义思想与科学理性、科学规律的关系问题。阿尔都塞的“认识论断裂”说是这一对立与斗争的重要表现之一。

二

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的坚强决心令人钦佩,他的基本观点也有合理之处。《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问世之后确实有许多人借这部著作把马克思解读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或存在主义者,而这的确是在开历史倒车,是在把马克思贬低为他曾激烈批判过的德国意识形态家。不仅如此,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哲学界一直存在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和从科学的角度对马克思哲学思想不同解读之间的对立与斗争,这表明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的战斗今天仍在继续。但问题是,阿尔都塞的核心观点,他所说的那种“断裂”,实际上并不存在。

在写于 1859 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对自己 1842 年至 1845 年思想的发展做过简要说明,把它分为三个阶段:第一,《莱茵报》时期需要对物质利益问题发表意见,需要关注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问题,促使他开始关注经济学;对德国流行的哲学共产主义不满但又因自己研究不充分无力发表意见,使马克思从社会舞台退回书房。第二,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分析认识到,国家和法“既不能从它们自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 18 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① 马克思下决心研究政治经济学。第三,“我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后来因基佐先生下令驱逐而移居布鲁塞尔,在那里继续进行研究。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②。马克思接下来表述的就是被阿尔都塞称作科学理论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形态等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由上所述可以看出,马克思把自己哲学思想的形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90—591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第 591 页。

成看作一个连续过程,有阶段,但并无断裂。

在马克思思想阐释方面,恩格斯毫无疑问是最大权威,然而他的观点也不支持"认识论断裂说"。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恩格斯说:"对抽象的人的崇拜,即费尔巴哈的新宗教的核心,必定会由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来代替。这个超出费尔巴哈而进一步发展费尔巴哈观点的工作,是由马克思于1845 年在《神圣家族》中开始的。"①而我们知道,阿尔都塞是把《神圣家族》归入马克思尚处于费尔巴哈崇拜阶段的"断裂"前的著作的。在《〈共产党宣言〉1888 年英文版序言》中,恩格斯在概述了作为全书核心思想的唯物史观后讲到这一思想在他和马克思那里的形成历程:"我们两人早在1845 年前的几年中就已经逐渐接近了这个思想。……到 1845 年春我在布鲁塞尔再次见到马克思时,他已经把这个思想考虑成熟,并且用几乎像我在上面所用的那样明晰的语句向我说明了。"②此外,恩格斯在晚年的一封信中说:"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起源,在我看来,您在我的《费尔巴哈》(《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就可以找到足够的东西——马克思的附录其实就是它的起源!"③所谓附录,即马克思写于 1845 年春天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在阿尔都塞看来,马克思思想断裂的位置是《德意志意识形态》,在它之前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只是"断裂的前岸"(15 页),就是说,是马克思费尔巴哈人本主义阶段的最后著作。显然这与恩格斯的说法是不一致的。

阿尔都塞的"断裂说"有悖于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与客观事实也不相符。

"断裂说"与阿尔都塞对唯物史观的理解有关。他说:

> 从 1845 年起,马克思同一切把历史和政治归结为人的本质的理论彻底决裂。这一决裂包括三个不可分割的理论方面:
>
> (1)制定出建立在崭新概念基础上的历史理论和政治理论,这些概念是:社会形态、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经济起最后决定作用以及其他特殊的决定因素等等。
>
> ……(222—223 页)

在他看来马克思的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但他认为马克思首先是建立了历史科学,即历史唯物主义,然后进一步建立起作为世界观的辩证唯物主义,④而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用社会形态、生产力、生产关系等概念解释历史的理论。实际上,用社会形态以及生产力、生产关系等概念解释历史的确是马克思的思想,但不是马克思历史理论的全部,更不是这一理论的核心。

阿尔都塞的主要依据是,马克思 1859 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目的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14 页、30 页)清算从前的哲学信仰确实意味着新的哲学思想已经形成,但是马克思的新思想究竟是什么,阿尔都塞并没有全面准确地把握。他认为就是用社会形态、生产力、生产关系等概念对历史的解释,这一认识漏掉或者刻意回避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马克思对新思想的阐述集中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⑤主要是下面这段话:

> 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95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4—15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0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647 页。
④ "就像泰勒士建立的数学'导致了'柏拉图哲学的产生,伽利略建立的物理学'导致了'笛卡尔哲学的产生一样,马克思所建立的历史科学'导致了'一种新的、革命的实践哲学和理论哲学的产生,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或者说辩证唯物主义。这种史无前例的哲学相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历史唯物主义)来说有些滞后……。"(第 253 页)
⑤ 参见安启念:《从〈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的文本结构看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观思想》,《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2 年第 12 期。

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这种观点表明:……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由此可见,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①

略加分析可以看出,它包含了阿尔都塞理解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容(虽然表述不够成熟),但是又有三个阿尔都塞忽略的重要思想。其一,马克思不仅一再强调宗教、哲学、道德等思想观念是被生产方式和由它产生的市民社会,即生产关系,决定的,而且明确指出生产方式和市民社会是由物质生产实践决定的;其二,马克思对物质生产实践如何决定生产力、资金、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还有人,做了具体说明;其三,他对唯物史观作了概括,认为可以把它概括为:“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实际上就是用物质生产活动引发的自然界、社会(所谓的“环境”)和人的相互作用协同发展来解释历史。概括而言,阿尔都塞忽略了马克思以及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重要思想——劳动实践活动在历史中起着决定作用。马克思用劳动实践活动解释社会存在,即生产力、生产关系,再用社会存在解释社会意识,其实质是用劳动实践解释全部社会生活及其历史。阿尔都塞强调后一半,对前一半从未提及,没有全面把握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

如果全面理解马克思,可以看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在此前的著作中就有论述。

被阿尔都塞称作“断裂前岸”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三条:

关于环境和教育起改变作用的唯物主义学说忘记了: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因此,这种学说必然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凌驾于社会之上。

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②

“在实践活动中,人改变环境,被改变的环境改变人”,这正是《德意志意识形态》概括的历史唯物主义。如果不懂得在实践基础上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协同发展,即使是唯物主义者也会因把环境和教育的改变从而人的发展动力归结于少数凌驾于社会之上的英雄人物,而陷入唯心史观。

在阿尔都塞称作“离即将升起的太阳最远”的《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③他还说:“通过异化劳动,人不仅生产出他对作为异己的、敌对的力量的生产对象和生产行为的关系,而且还生产出他人对他的生产和他的产品的关系,以及他同这些他人的关系。”④马克思又说:

私有财产的运动——生产和消费——是迄今为止全部生产的运动的**感性**展现,就是说,是人的实现或人的现实。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⑤

马克思的这些论述,其内容与《德意志意识形态》关于唯物史观的论述完全一致。都是把劳动实践活动视为全部历史的基础,并且用物质生产活动解释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人们的观念。

由上所述可以看出,从《1844 年经济学哲学

---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第 544—545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第 500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第 196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第 165 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第 186 页。

手稿》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再到《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的思想并没有根本变化,以物质生产为基础和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一以贯之,他的思想是一个一贯的、连续的发展过程,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成熟。

阿尔都塞之所以提出“认识论断裂说”,重要原因是:第一,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大量使用“类”“人的类本质”“异化”等费尔巴哈的术语。谈论“人的类本质”意味着承认有作为“类”的人,即超越社会关系制约的一般的人,以及他们的共同本质。这是费尔巴哈津津乐道的,是他的哲学思想的本质特征。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①“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是指人的生产劳动活动,在后面的论述中马克思明确地称生产劳动为“人的类本质”。可见在“人的本质”问题上马克思和费尔巴哈的论述非常相似。第二,直到 1845 年 2 月,马克思仍在高度称赞费尔巴哈。《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说:

> 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以及整个实证的批判,全靠**费尔巴哈**的发现给它打下真正的基础。从费尔巴哈起才开始了**实证的**人道主义的和自然主义的批判。②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甚至说:

> 到底是谁揭露了“体系”的秘密呢?是**费尔巴哈**。是谁摧毁了概念的辩证法即仅仅为哲学家所熟悉的诸神的战争呢?是**费尔巴哈**。是谁不是用“**人的意义**”(好像人除了是人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意义似的!)而是用“人”本身来代替包括“无限的自我意识”在内的破烂货呢?是**费尔巴哈**,而且仅仅是**费尔巴哈**。他所做的事情比这还要多。③

第三,《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唯物史观的阐述强调实践、物质生产活动对于人的重要意义,很容易使人联想到《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人的类本质”的思想,想到费尔巴哈的提法。总之,由于以上原因,阿尔都塞认为,直到《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尚未彻底摆脱费尔巴哈的抽象人道主义。

实际上这只是表明阿尔都塞不懂得劳动实践活动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中的重要地位,为表面现象所迷惑,没有看到马克思与费尔巴哈使用类似术语所表达的思想的原则区别。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借《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发表把马克思解读为抽象的人道主义者,并且否定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阿尔都塞挺身保卫马克思,值得赞许,但是他没有真正明白自己所要捍卫的马克思的思想。不论是阿尔都塞还是他的论敌,都误解了《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在讲到自己的思想历程时说:

> 由于费尔巴哈揭露了宗教世界是世俗世界的幻想(世俗世界在费尔巴哈那里仍然不过是些词句),在德国理论家面前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个费尔巴哈所没有回答的问题:人们是怎样把这些幻想“塞进自己头脑”的?这个问题甚至为德国理论家开辟了通向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道路,这种世界观没有前提是绝对不行的,它根据经验去研究现实的物质前提,因而最先是真正批判的世界观。这一道路已在“德法年鉴”中,即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这两篇文章中指出了。但当时由于这一切还是用哲学词句来表达的,所以那里所见到的一些习惯用的哲学术语,如“人的本质”、“类”等等,给了德国理论家们以可乘之机去不正确地理解真实的思想过程并以为这里的一切都不过是他们的穿旧了的理论外衣的翻新。④

这是马克思对自己思想发展进程的阐述。他没有提《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因为该手稿未曾发表,不为人知;提到了在它之前的《德法年鉴》中的两篇论文,因为它们已公开问世。马克思告诉我们,他的哲学思想的转变在早于《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德法年鉴》中已经开始。更重要的是他还告诉我们:他的思想是对费尔巴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第 162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第 112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118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261—262 页。

哈的扬弃,使用“人的本质”“类”等费尔巴哈的术语,是在表述与费尔巴哈不同的思想。阿尔都塞和他的论敌对马克思产生误解,以为他还没有超出费尔巴哈抽象人道主义的局限,原因就在这里。

三

误解马克思,不懂得劳动实践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重要意义,是阿尔都塞最重要的理论失误。

马克思使用了人的类本质这一费尔巴哈标志性的概念,但他赋予这一概念的内涵,与费尔巴哈完全不同。首先,费尔巴哈以及其他谈论人的本质的哲学家,对这一本质的认定都是出于主观想象、臆断。马克思不同,他立足于客观事实和科学理性。前面提到,他说“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就是说,他把了解生命活动的性质作为确定一个物种本质特征的方法。这是有充分事实依据的。维持和延续生命是一切物种的本能,不同的物种有不同的生命活动方式,该物种的所有个体都必须服从这种活动方式,否则它就无法生存,而个体的一切活动都必须服从生命活动的需要,因为只有这样它才能够有效地维持和延续生命。这从根本上决定了种的类特性就是它的生命活动的性质。

这一思想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得到进一步阐述。他说:

> 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
>
> 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即迈出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这一步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①

马克思在这里指出,物种的生命活动的性质是由它的身体的生理构造决定的,是客观存在。人的肉体组织的生理特点决定了他只有从事劳动生产,改造自然,才能获得维持和延续生命所必需的物质生活资料,因此马克思才说劳动生产是人的类本质。他对人的类本质的认定体现出严格的科学理性,是与费尔巴哈完全不同的。

其次,更重要的区别是对类本质的规定,这里包含着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全部秘密。费尔巴哈提出人的类本质是理性、意志、爱,而这三者,特别是他所看重的爱,没有任何具体规定,被认为可以适用于一切时代、一切人。正因为如此,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才体现出强烈的抽象性,遭到马克思恩格斯的猛烈批判与辛辣嘲讽。情况在马克思那里完全不同。马克思认为劳动实践是人的类本质,正是劳动实践活动使得马克思与一切抽象人道主义理论划清界限,为他的历史唯物主义奠定了坚实基础。

这是因为劳动实践活动具有自建构性。劳动实践是对自然存在的改造,被改造了的自然向人展现出新的方面,提供了新的信息,人的科学认识得到提高。科学认识的提高会带来新的技术,使人有可能制造出新的工具,获得新的生产力。使用新工具需要人进行新的分工,劳动分工是生产关系的核心内容,生产关系由此得到改造。服从新的分工、使用新的工具、作用于新的被改造过了的自然,意味着劳动实践活动本身有了新的内容、新的面貌,得到提升。新的劳动实践活动再次改造自然,科学认识、生产工具、劳动分工(即生产关系)又一次改变、更新,而一旦这些因素发生改变,劳动实践活动又一次被提升,得到发展。劳动实践活动在不断地自我改变、自我提高,这就是它的自建构性。由于自建构性,劳动实践活动表现为一个不断自我发展的历史过程。《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说: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德意志意识形态》说: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由此可见,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第 519 页。

也创造人。以上论述所说的,正是劳动实践活动的自建构性。

劳动实践活动的自我建构使它不断地变化、发展,表现出历史性。作为它的要素,自然界、生产力、生产关系在不断改变,人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他的现实的本质也表现为历史发展过程。是劳动实践活动使劳动对象、劳动能力(生产力)、劳动分工(生产关系)、劳动者,包括劳动者的思想观念,运动起来,具有了历史。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由于建立在劳动实践活动基础之上,对自然界、社会、人本身等劳动要素的变化发展都做出了科学解释。相对于我们通常把历史唯物主义仅仅理解为社会历史观,这是一种涵盖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本身的大唯物史观。不仅如此,只有它才是真正的唯物主义历史观。阿尔都塞理解的历史唯物主义用生产力解释全部社会生活,但由于不懂得劳动实践活动的重要意义,不能科学地说明生产力又是如何发展的,因而很可能在这一点上失足滑入历史唯心主义。早在一个多世纪以前,普列汉诺夫就指出:

> 为着生产,必需劳动工具。这些工具不是由自然以现成的形式给予的,它们是由人们发明的。发明,甚至简单地使用某一工具,需要在生产者身上有一定的智慧的发展。因此,“产业”的发展乃是人类智慧发展的无条件的结果。所以,意见、“教育”就在这里亦是完全地支配着世界。①

普列汉诺夫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之所以是唯物主义理论,是因为马克思用劳动实践活动解释了人制造工具的能力是如何发展的。他说:劳动是人对外部自然的作用,“可是‘在作用于外间自然时,人改变了自己本身的天性’。在这几句话中包括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的全部本质”。②

马克思大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点是把劳动生产作为人的类本质,由于劳动实践活动的自建构性,作为劳动者的人,他的现实本质是不断变化的。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真正的现实的人。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才说:“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要研究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③谈论人的类本质并非必定沦为抽象的人道主义,马克思的思想便是如此。

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那些借《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把马克思人道主义化的人,和因《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而把马克思的思想和费尔巴哈的抽象人道主义相等同的阿尔都塞,都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关于人的类本质的思想。

由于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关于人的类本质的思想,阿尔都塞一方面误解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前,特别是《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真实关系,另一方面也不可能真正把握这一阶段马克思与黑格尔的思想联系。他认为《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最后关头④“实际上是要用费尔巴哈的假唯物主义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颠倒’过来。”(18 页)把费尔巴哈和黑格尔结合在一起是不可能的,他们犹如理论磁场的两极,放在一起会引起爆炸。(见 19 页)他断言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前马克思不但不向黑格尔靠拢,而是离他越来越远,因此马克思这部书中向黑格尔“求助”,是“逆反应”,是倒退,这也使得该书成为“离即将升起的太阳最远的著作”。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样。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说:

> 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辩证法,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

---

① 普列汉诺夫:《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北京:三联书店 1961 年版,第 30—31 页。

② 普列汉诺夫:《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第 107 页。普列汉诺夫的这一观点可以在恩格斯那里找到证据。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恩格斯把他和马克思的哲学归结为“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新派别”。他在该书第三章末还说:“要从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转到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就必须把这些人作为在历史中行动的人去考察。”恩格斯在通信中讲到唯物史观时曾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704 页。

④ 应该是指《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部分。

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人**自己的劳动**的结果。①

仔细一看我们会发现,这不正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吗?这不正是马克思用费尔巴哈的物质的、肉体的人取代黑格尔的自我意识因而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新解读吗?“对象化”就是人在劳动实践中对自然的改造,精神变物质;“非对象化”就是被改造的自然给人提供了新的信息被人认识,物质变精神。这正是劳动实践活动“自建构性”的表现,是费尔巴哈与黑格尔哲学思想积极因素的成功结合。阿尔都塞彻底否定了马克思的类本质思想,当然看不到马克思这段话所包含的宝贵思想,相反把它看作马克思的思想倒退。

结束语:阿尔都塞提出“认识论断裂说”是因为他没有弄懂马克思的劳动实践概念,因而看不到马克思“人的类本质”概念包含的革命性内容,误以为它是马克思尚未超出费尔巴哈抽象人道主义的证明。实际上这表明阿尔都塞和他所批判的把马克思变为抽象人道主义者的人一样,都把早期马克思和成熟马克思对立了起来——前者是抽象人道主义者,后者是科学世界观的创立者。这种对立是不存在的。相反,马克思的劳动实践概念真正揭示了整个世界,包括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自身,是如何相互作用协同发展的。它既体现了人道主义,也体现了科学理性,是二者的结合。这是马克思对人类哲学思想的伟大贡献。阿尔都塞重新把二者割裂开来,是真正的“倒退”。马克思的宝贵思想被阿尔都塞的误解掩盖了。多年来他的错误以各种形式不断翻新,影响极大,阻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发展。想要捍卫马克思,反倒因误解马克思而危害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就是本文对阿尔都塞马克思哲学思想“认识论断裂说”的总体评价。

(责任编辑　　刘曙光)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第 205 页。